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大厦店
华夏银行店
海航万绿园店
南方出版社店
国秀城店

《巫术师》

本书是当代英国文坛超重量级大师约翰·福尔斯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不但被选为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经典，也是英美各大学英语系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课程的必读作品。

全书在心理描写上极为细腻深入，结构奇巧，故事在历史和现实间不断切换，扑朔迷离，更揉合了文学、哲学、绘画、音乐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带领读者体验一场难以置信的阅读魔法冒险。



作者: 约翰·福尔斯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

本书收录了巴塞尔姆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作品，而这段时期也正是巴塞尔姆的创作开始崭露头角并渐入佳境的一段关键时期。这段时间中，他所做的任何创作和尝试，都一次次地颠覆着人们对小说的理解。

相比巴塞尔姆其他书名标新立异的作品，本书的书名虽看似波澜不惊，却体现了巴塞尔姆站在更宽广的领域对待其作品的态度。书中汇集了他的八部已出版的重要代表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每个故事都从它的创造者对于这一篇本身要求什么的直觉中获得它独一无二的形态。每一篇都在用自己的声音唱着自己的调子。



作者: 唐纳德·巴塞尔姆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萝卜计划:北大奇人怪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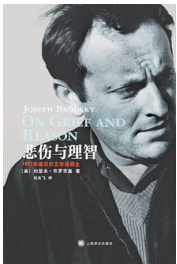
如何才能制订出不依赖意志力的计划？怎样做到专注？怎样调整状态？《萝卜计划》通过一个个精彩有趣的故事和案例帮你解决心理问题。意志力强肯定有利于完成计划，但好的计划会尽可能将完成计划的过程变得轻松愉快。每天进步一点点，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大多数中学生深明此理却难以克服人性的浮躁，或好高骛远或半途而退。具体如何才能实现“如萝卜般深扎泥土，经得起风雨”的学习计划，正是本书所要强调的重点。



作者: 吴业涛
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悲伤与理智》

在这部题材丰富、视界浩瀚的散文集中，约瑟夫·布罗茨基开篇便用深沉内省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在苏俄的早年经历以及随后去往美国的流亡生涯。接着，作者用惊人的博学探讨了诗歌的张弛变幻、历史的本质、流亡诗人的双重困境等一系列颇具广度与深度的话题，思维的触手延揽古今，上及古罗马贤帝马可·奥勒留，下至现代诗人托马斯·哈代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美学的炽烈情愫揉合锻造为继《小于一》之后的又一部世所罕见的奇作。



作者: 约瑟夫·布罗茨基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梁鸿：

历史与我的瞬间

文|本刊特约撰稿 何晶



梁鸿近照

《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作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梁鸿最新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日前由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梁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该书收录梁鸿27篇随笔散文，均为首次结集，沉潜的思索悲悯大地，优美的文笔直见性灵，是梁鸿继《出梁庄记》后带给读者的又一份礼物和欣喜。

该书分“归来与离去”“文学在树上的自由”“我们曾历经的沧桑”三辑。在梁庄和都市之间，归来、离去、重返；在书斋和乡野间，游走求索；读书论世，与大师也与自己相遇。

梁鸿说，重返梁庄最初或许只是无意识的冲动，但当她站在梁庄大地上时，似乎找到了通往历史的联结点。“从梁庄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经验找到了在整个时间、空间中阐释的可能。两者相互照耀，彼此都获得光亮。”

重返梁庄的意义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让梁鸿声名大噪，也让梁庄走进了许多读者的视野。但这两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著作，梁鸿以亲属的身份进入梁庄，“这是我个人的梁庄，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梁庄”。她回忆起当初自己重返老家并起念写书，似乎是完全无意识的行为，但今天回头看，她认为自己是在借梁庄来扩张个人经验，同时在历史的废墟上重建自己，“历史是活生生的‘在’，只有思考、反思，才能达到真正的存在。”

梁鸿认为，可以这么说，当“60后”知识分子在如醉如痴地吸收学习西方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时，还只是少年的“70后”则如醉如痴地阅读来自于港台的琼瑶、三毛、金庸，并沉溺于一种自我营造的感伤和对传奇的向往之中，或因模仿港台剧中的英雄人物而成为小镇的不良少年，或如我这样，被像拔刺一样把叛逆的因子一点点拔掉。

梁鸿说，对于“历史”、“社会”这两大名词，“70后”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家人的闲谈，哪怕并不遥远的“大跃进”“文

革”，也只存在于支离破碎的话语之中，与现实的生活与情感都无关。没有上战场（虽然这战场只有在叙事时才有意义），没有经历宏大场景，没有荣耀、炫耀和言说的资本，没有被安排继承历史遗产，也没有来得及领悟新的历史规则并投入其中，却总是被历史的碎屑、生活的边角料所击中，这些碎屑是如此琐细、不重要，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被提起，但却仍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代人的 人生。进入大学教书后，这种感受日益强烈。

历史就是你自己

1986年，几个来自南方的贩子来到梁庄吴镇，吆喝着收麦冬，一斤麦冬两块多钱。那一年，种麦冬的人家都“发财”了。富裕的“南方”第一次进入梁庄。当年，梁鸿的父亲把小麦地、玉米地全毁了，也种了五六亩麦冬，收获时，雇了二十多个人，父亲每天计算着能挣多少钱，还多少债，剩多少钱，家里村里，到处是欢声笑语。

但是，第二年，南方的小贩没有出现，吴镇的许多人家因麦冬而破产，抵押房产、跑路、逃避债务，有熟识的人家一再筹措路费到广州去要债，但每次都凄惨而归。在梁鸿的记忆里，这是“南方”作为具象第一次来到北方的乡村里。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彼此间的二元对立和残酷性就这样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1988年，15岁的梁鸿在县里念

师范学校。一天，她和女同学在走廊聊天，被发现批评时，嘟囔了一句：“又不是在搞同性恋。”当天晚自习，班主任把梁鸿叫出了教室，愤怒地说：“你知道那是啥吗？你还要不要脸？”

围绕这件事，梁鸿被连续批评了六天，“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同性恋’是一个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道德的、罪大恶极的词语。”梁鸿说，在这背后，有一个洪水猛兽般的“西方”：色情的、无耻的、变态的世界。“西方”就这样以一种奇异的纠缠状态出现在1980年代后人中国日常生活中。梁鸿用这两个事例来讲述她如何用个人经验找到进入历史的切入点。“我发现，当把目光有意识地投向与‘我’相关的事物，你会很容易察觉到它内在的生长性和历史性。”她说，回到梁庄于她而言是一种激活，她重新找到了思考的起点和支点，并激活了自己的生活——学术生活和实在生活。

在梁鸿看来，历史意识的生成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无关，重要的是“我”与历史的联结方式。历史就是你自己。她说：“能粉碎大历史框架的恰恰是个人记忆，是历史空白处的碎屑和不引人注意但却又久远的伤痛，它影响甚至制约着历史的运行。”

最后，梁鸿说，历史赋予了我们一个个瞬间，能够对这瞬间所包含的形式及与世界产生的关联进行思考，我们就汇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洪流。

（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



《历史与我的瞬间》封面